

我的“四清”经历

○ 廖万清（1964届自控）

1964年8月，我从清华自动控制系毕业留校。这年9月，中央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上级指示，清华党委很快做出决定，抽调师生参加“四清”。自控系安排总支委员唐美刚、苗永蔚，教师陈梓强，工人金恩英，新留校的教师齐振、石晔和我等7人参加这一期“四清”。其他系除教师外，还有部分研究生和力5、建5班的学生参加。全校组织了147人的“四清”队伍，以校党委常委李恩元、动农系总支书记蒋企英、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孝文三位老师为领队。国庆假期后，准备参加“四清”的师生，开始在学校集中学习。由于高教部在河北邯郸搞“四清”，时任部长的蒋南翔校长在那里蹲点，因此清华决定前往邯郸下属的永年县参加“四

清”，还派了先遣组去实地了解情况。

在学校集中学习时，我们系与机械系的教师康春华、姜天兴，试验化工厂的教师陈亨及建5的同学共10多人编为一个组，在靠近南校门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二楼学习讨论。主要是阅读中央有关“四清”的文件和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四清”蹲点的经验介绍。校党委刘冰副书记还在工字厅后厅会议室，专门给准备参加“四清”的教师做动员，介绍了当年他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搞土改的经验。

工作队开进试点村

1964年10月下旬，去河北永年县了解情况的先遣人员回到学校，向我们介绍了当地农村的情况。正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北京市委提出三年内搞完市郊农村“四清”的计划，将试点范围从通县扩大到顺义县，要求北京高校参加郊区农村“四清”。于是清华放弃去河北的打算，由市委统一安排，与中央党校、朝阳区等单位组成一个级别高、阵容强大的“四清”工作分团，负责顺义县南法信公社的“四清”。分团团由朝阳区委副书记刘玉满担任，副团长由中央党校的桑子楨、清华的李恩元担任。

“四清”初期，有不能“同年”整“同年”的不成文规定。要求具有行政17



1963年毕业前夕与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永慧、李恒远、陈文权、叶庆华、陈修环，后排左起：廖万清、陈大义、李鸿敏、王秀亭

级（相当于副县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担任工作队长。由于清华的教师级别低（大多数是21或22级），只有李恩元、蒋企英两位老师有此资格。他们分别担任了衙门村生产大队和南圈生产大队的工作队长，这两个大队也成了以清华师生为主的试点村。

我所在的工作队南圈大队，距顺义县城六七华里，只有两个生产小队，60多户人家。工作队共18人，其中清华师生11人，包括动农系的蒋企英、顾惠君、蒋孝煜、汪幅华，自控系的苗永蔚、齐振和我，土建系的苗赫濯等都是教师。还有土建系研究生杨士萱、李孝美，力学学生张大洋。此外，还有北京师范学院教师1人，学生2人；北京第一机床厂干部2人，市商业系统2人。清华动农系总支书记蒋企英任队长，一机床厂党办主任张建华任副队长。张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转业干部，为人直爽，说话有点口吃。第一生产队由苗永蔚老师负责，第二生产队由顾惠君老师负责。工作队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正副队长兼任书记、副书记，委员有苗永蔚、顾惠君、周正新。周是华中工学院1963年毕业生，在校时担任过学生会干部。

进村前，分团全体工作队员在朝阳区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互相见面介绍情况和进行讨论。11月15日，我们带上各自的铺盖坐着卡车来到村里，大家按团部统一规定，分散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开始了四清的第一阶段——“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工作。

我和苗老师住在贫农房东邵仕信家里。老两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原是公社团委书记，前两年才结婚，没有多久就得

急病去世，儿媳也改嫁了。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时年十五六岁。我们清晨天一亮就起来，先把水缸挑满水，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去吃“派饭”。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或家访，或内部开会。

生产队的土地大部分是平原水浇地，每年秋收之后，都要赶在小雪节气大地封冻之前，将地平整一次。平整土地，推小车运土，作田埂之类的一般农事，活并不重，但是与长年累月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社员比较起来，我们是自愧不如。第一天，还可以靠冲劲与青年小伙子比一比，第二天下来就感到力不从心，跟老社员比的劲头都没有了。工作队员中，除正副队长之外，年纪较大的就数清华动农系的蒋孝煜副教授了，他是留苏副博士，汽车专家，也与我们一样下地干活。干了几天活之后，工作队员与社员便渐渐熟悉起来，半个月之后工作队改成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开会分析情况。

“三同”与“派饭”

四清工作团对队员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如：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一日三餐必须轮流在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不准吃带荤腥的菜。

晚上，我们分头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了解情况。自从土改后，多少年来干部下乡都是先找大小队干部了解情况，与他们商量如何开展工作。“四清”与过去不同，工作队进村后，把他们晾到一边，独自摸情况、找问题，使他们很不理解。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员的脑子里，已经预先灌输了“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

□ 母校纪事

盟者手里”的思想，因此，工作队一开始就采取了类似土改时的工作方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寻找运动的依靠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年农村经济形势虽然开始好转，但社员家里粮食仍然偏紧。特别是农闲的时候，每日三餐主食都是一干二稀，即早晚吃棒碴粥、白薯，中午才吃玉米饅饅或者贴饼子。副食方面，早餐只有咸菜，整个冬天，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是大白菜或者萝卜、粉条。开始，我们只到较贫苦的农民家里吃“派饭”。两三个月后，我们逐渐到中农、一般干部家里吃。在那里，偶尔能吃到大葱蘸面酱或者小葱拌豆腐就算是“高级菜”了。中午有时也可以吃到饅饅面条。做这种面条，要将二尺多长方木做的饅饅床子放在大锅上，锅里的水烧开后，把和好掺有榆皮粉的玉米面放在床子里，轧成长条后掉在锅里煮熟即成。它虽然赶不上小麦面粉做的面条那样细软，但比饅饅、贴饼子好吃多了。因为将榆树皮碾成粉费时费力，所以一般人家也不常做。每逢农村节日，家庭条件好些的，也做一两顿将大米小米混在一起煮的“二米饭”给我们吃。

刚进村吃“派饭”时，社员们都把我们当客人看待，以工作队员能到他们家里吃饭为荣，认为这是政治上对他们的信任，生怕慢待了我们。而且我们每天按照城市生活标准付给他们一斤二两粮票、五角钱，因此，开始给我们做的饭菜都在农村日常生活水平之上。但我们都坚持不吃细粮和荤腥，他们也就不做了，真正做到他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一天三顿，两顿以白薯为主，吃得肚子发胀，胃里泛酸，要靠多吃咸菜来减少胃酸。这种

用萝卜腌的咸菜家家都有，滴上几滴自制的农家香油后，吃起来特别可口，其香味至今难忘。

北方因为气候寒冷，睡的都是火炕。白天一般都将炕上的被褥卷到一边，吃饭的时候，在炕席上放张约半尺高的小炕桌，人们坐在它的周围吃饭。家里来了客人，都要让他们坐在热炕头上，以示尊敬，但却苦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在炕上盘腿而坐，一顿饭下来，双腿早已麻木得下不了炕。后来，他们也就不再跟我们客气，我们也乐得坐在炕沿。个把月以后，我们盘腿而坐的基本功已练得差不多了，也不再计较坐在炕头还是炕沿了。

大学学习期间，我们每年都要下乡支援夏收或秋收，但都是单独办伙食，时间也短，对城乡差别体会不深。人们都说北京郊区的农民比较富有，实际上，那只是近郊的部分农民。我们所在的南圈村，离县城不过几里地，不仅没有电，而且全村只有一部电话，还是和有线广播共用一条线路，电话放在大队部，由一位残疾人专门看管。晚上，我们点的都是煤油灯。

北方的冬天黑得早，没有月色的夜晚，到处是黑乎乎的，环境显得特别安静。由于白天劳累，晚上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常常八点钟一过就发困。那时，煤油也是稀缺物品，要凭证定量供应，而且昏暗的煤油灯根本无法满足工作队晚上开会、办公的需要。于是，便用土制乙炔灯来照明。这种灯很简单，使用时，只要放一小块电石到罐子里，加上些水，盖紧盖子，用火柴在出气口点燃乙炔，便发出“贼亮”的火焰，它比40瓦的灯泡还要亮。这种灯虽然简单方便，但燃烧时有一

股难闻的气味，且给罐中的电石加水，一次不能太多，否则反应太快，乙炔会很快烧完，甚至引起爆炸。

村里大部分社员住的都是土房。标准的房子是坐北朝南，一进三间，从中门进去，中间是厅兼厨房，厅内两侧都有一个灶台，左右各有一门通向东西住房，房内的土炕与灶台的出烟口相连，这样可以利用锅灶烧水做饭的余热把炕烧暖。住房朝南开有木格窗户，糊以白纸透光，房顶两三年就要用麦秸和泥重新抹一次，才能保证雨天不漏水。

工作队的灯油费、办公费和烤火费，都由“四清”工作分团供给。分团设在南法信公社，离南圈有八九里地远，那时清华借了一辆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给我们，每次都由我骑着车去分团领取和报销这些费用。那时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和驴车，各村之间的大路全是土路，被马车压出深深的两道车辙，自行车只能顺辙而行，一不小心，就要摔跤。

工作队住的地方一般都是社员腾出的闲房，睡的是平时不烧的土炕。蒋企英老师因此得了腰疼病，要卧床休息，打封闭治疗。烧炕取暖要用煤球，农村没有现成的煤球卖，只好买来散煤自己做，于是我们也学会了摇煤球。

进入11月底，大地已经开始封冻，农村转入农闲季节，主要农活是积肥、平整土地和兴修水利。通过参加劳动和吃派饭，我们对村里人和事以及各家各户的情况，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这里的农村，男性青壮年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力，担负大田粮食的生产、运输等工作，三十多岁以上的妇女差不多都是小脚，她们和年轻妇女主要从事种菜和场院活。家庭生活水

平，完全取决于家中是否有子女在外面工作，或者家里劳动力的强弱，人口有多少。小孩多，或有老弱病残之家，生活肯定困难。例如，我们工作队正副队长的房东赵本文，是地道的贫农，还是大队贫协的主席，但他的两个儿子在外面工作，一个女儿在小学当教师，家里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生活颇为富足。

有鱼没鱼，水掏干了才知道

实际上，南圈大队是公社的一类队，一队90%以上的人家都姓邵，二队半数以上都姓岳，宗族矛盾不突出。大队一半以上的土地是水浇地，亩产不低，每年都能完成公社规定的上交粮食任务。大队公有资产甚少，很难谈得上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顶多也就是参加劳动少些，工分补贴的比例高了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邵怀信是个老实人，他整天忙于大队的事，妻子有精神病，家庭十分贫困。大队长邵怀忠当了多年的大队干部，在村里有威信，工作能力强，群众意见多，不愿意多管事。治保主任邵怀强，实权大，群众意见也大。我们清查了大队历年的账目。所谓账目，也就是一年百把笔数目在几元到十多元的开支，和一大堆白条。结合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连大队历年来给家禽打防疫针的账都查了，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村里有限的几个“五类分子”早已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在运动初期，一些“勇敢分子”主动向工作队反映干部的经济问题，但经过调查研究，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一件也落实不了。

对于这样一个大队，本来应该实事求是地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按照总团的部署，运动还是要逐个阶段

□ 母校纪事

进行，不能走过场，“有鱼没鱼，水掏干了才知道”。在扎根串连之后，进入“四清”阶段，发动群众揭发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召开批判大会，把干部和社员中一般的经商贩运行为当作投机倒把，把解放前参加过迷信组织“先天道”的一般成员看成重大历史问题，上纲上线，搞得干部灰溜溜的。

1965年初，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肯定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转眼到了春节，工作队放假一个星期，由我和张大洋在村里留守。春节期间，不方便再去社员家里吃“派饭”，于是我们向老乡借来锅碗瓢盆，凭票证到顺义县城买来猪肉、鸡蛋、豆腐、蔬菜和挂面等食品，自己做饭吃。在北方农村，是没有洗澡条件的，我们专门到县城澡堂去洗了一次澡。

春节之后，工作队根据大队的实际情况，解放了大多数干部，并着手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不久，田地开始解冻，小麦返青，棉花、玉米播种的季节也跟着到来，春耕大忙开始了。工作队对生产十分重视，因为农业增产是“四清”验收的一条重要标准，北京市委规定，生产没有搞好，工作队不能出村。

小麦是南圈大队的主要农作物，收成



2004年校庆，自408班同学返校参加毕业40周年纪念合影。中排左5为廖万清，后排右3为一同参加清华“四清”的石磊

如何，直接影响大队的粮食产量。工作队让我负责抓农业生产，我在大队部找到一张北京市农业部门编印的小麦管理图，每个生长阶段，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有非常具体的说明，我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正当小麦生长良好之际，突然发现部分麦苗枯萎发黄，原来是蝼蛄在一夜之间把好端端的麦苗连根带叶啃个稀巴烂，我赶紧打电话向农业站的技术人员请教治虫办法，很快就消灭了虫害，保证了小麦的全苗，为高产打下了基础。

北京的春天历来干旱，播下去的玉米缺苗严重，工作队要求生产队组织大家挑水补种，经过“蹲苗”（一段时间有意不浇水，让苗的根系增强），玉米苗全苗壮，生长良好。接着棉花苗又遭蚜虫之害，我们又动员大家采用小苗移栽的办法补救。

很快到了五一节，大队选出了新支书、大队长和贫协主席，“四清”工作队的各项任务已经大体完成。

6月初，就在小麦即将收割的时候，我们全体工作队员离开了南圈村。从进村

算起，历时整整七个月的“四清”运动，规模是如此之大。经过清查，大队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大队的经济账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工作队并没有为村里解决什么大问题，池塘里的水掏干了，却没有鱼。表面上看，大队干部更换了，年轻化了，但是，新的大队领导班子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吗？运动留下的各种矛盾如何化解，都将直接影响大队今后

的发展。一切都难以评说，只能让历史去检验了。

五十多年沧海桑田，如今顺义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区，公路四通八达，新楼绿树成片。我曾经生活半年多的这个小村，已无法辨认。但它原来的房屋地貌、大人小孩、生活习惯，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际，直到现在，仍然能叫出村里许多人的名字。

我的清华入学通知书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有感

○ 万书波（1978级自动化）

2018年11月下旬，有同学在班级微信群中发出一张我的1978年清华大学入学通知书和2018年清华大学新版入学通知书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同台展出的照片。看着这张新旧两版入学通知书照片，不禁感慨时光如梭、岁月有痕。

40年前，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大学招生制度改变了，恢复了高考。刚刚高中毕业的我赶上了好时候，参加了高考，填报了心仪的清华大学，然后，忐忑地等待着，焦急地期盼着。当终于接到入学通知书的一刻，感觉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未曾远离家乡小城市的我开始想象繁华的首都北京，想象着美丽如画的清华园，想象着怎样度过我的学习时光，会遇到什么同学和老师？会有什么故事？我幻想着、憧憬着美好未来。神奇的小小入学通知书将改变着我的命运。

其实，这也是同时代的同学们的共同记忆，当我们手揣着入学通知书从祖国各地先后汇聚于签到处的时候，老师们和那些本地或早到的同学们的亲切问候和帮助让我们备感温暖——从此，我和你就是同学了；从此，我和你就是同班同学了，我们是同一宿舍的，我们是上下铺的兄弟；



万书波校友的1978年清华大学入学通知书和2018年清华大学新版入学通知书